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

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郝庆军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郝庆军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 郝庆军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 7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 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699-1363-7

I. ①民… II. ①郝… III. ①文艺思潮—研究—中国—民国②文学运动—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473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Zhongguo Yishu Yanjiuyuan Xueshu Wenku

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Mingguo Chunian de Wenxue Sichao yu Wenxue Yundong

著 者 | 郝庆军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周海燕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264千字

版 次 |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363-7

定 价 | 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文章 连 辑

副主任 吕品田 田黎明 谭 平
贾磊磊 李树峰

委 员 丁亚平 方 宁 方李莉 牛克诚
牛根富 王列生 王海霞 王 馗
田 青 刘万鸣 刘 托 刘 楨
刘梦溪 孙玉明 朱乐耕 陈孟昕
何家英 李 一 李胜洪 李心峰
宋宝珍 吴文科 吴为山 杨飞云
杨 斌 范 曾 罗 微 欧建平
骆芃芃 祝东力 项 阳 莫 言
秦华生 高显莉 贾志刚 管 峻
(按姓氏笔画排序)

编辑部

主 任 王 磊

副主任 陈 曦

成 员 朱 蕾 李 雷 陈 越 柯 凡
蒲宏凌 戴 健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田海明

副主任 韩 进 王训海

委 员	余 玲	杨迎会	李 强	宋启发
	宋 春	陈丽杰	周海燕	赵秀彦
	唐元明	唐 伽	贾兴权	徐敏峰
	黄 轩	曾 丽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在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目 录

绪论 近代文学:观念革新与多维视野 / 1

第一章 民初文坛:政治鼎革与文化变迁 / 35

- 一 羁縻与打压:袁世凯政府的文化策略及复古倾向 / 37
- 二 文脉与人脉:民初的几个文人集团与晚清革命之关系 / 45
- 三 书报业与娱乐业:从期刊的繁荣看民初文学的娱乐化倾向 / 59
- 四 征逐、宴饮、写作:民初文人生活及其方式 / 76

第二章 鸳鸯蝴蝶派:生成、分布与审美情趣 / 87

- 一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一个社会学的解释 / 90
- 二 地缘分布:再绘鸳鸯蝴蝶派文学地图 / 102
- 三 如何鸳鸯,怎样蝴蝶——《玉梨魂》的文本分析 / 114

第三章 黑幕小说:源流、主题及其遭遇新文学 / 128

- 一 黑幕小说的源流:从谤书到谴责小说再到社会小说 / 131
- 二 上海作家的北京想象:黑幕小说里的京华故事 / 142
- 三 社会写真与恶意夸张:黑幕小说中的上海形象 / 152
- 四 物极必反:黑幕小说的恶性发展与新文学的反响 / 160

第四章 古典诗文：一个不应忽略的文学存在 / 174

- 一 “同光体”和宗中晚唐诗人的位置 / 176
- 二 意志的文学：南社诗人的激情与才绪 / 185
- 三 魏晋文与桐城文：在民初不同的命运 / 200

第五章 1916年：新文学的发生之成为可能 / 227

- 一 反省与觉悟：复辟前后先驱者的思考深度 / 229
- 二 新青年：文化革新的主体塑造 / 243
- 三 聚焦文学：一个必然的逻辑展开和现实需求 / 253

附录：昧于历史与过度诠释

——近十年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倾向 / 264

主要参考文献 / 279

后 记 / 285

绪论 近代文学：观念革新与多维视野

一 近代文学学科与知识权力建构

现在看来，所谓的“近代文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其实并不是一个客观先在的存在物，而是一个经过知识建构和人文积累的精神过程。命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行为，有着强烈的自我建构和排斥异己的思想动力。笼统而言，对“近代文学”进行命名，实际是为五四之后的所谓“现代文学”提供合法性，提高社会地位，重构历史主体，乃至新建文化秩序等活动开辟隐秘的航道。因此，“近代文学”通常便被定义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文学”，这种表述散见于各种类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叙述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研究组集体编纂的一套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资料汇编中，明确了这段文学史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之后，转而又不得不承认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地位：“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结尾和现代文学兴起的准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研究近代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剖析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所出现的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有所区别的特点，以便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它在我国文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这是文学

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①

把“近代文学”规约成为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学，一种向现代文学转型的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常识”的形成需要知识累积和文化资本的不断注入，也需要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知识界达成某种“默契”与共鸣，二者联手，给“常识话语”不断“施魅”，才能使得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令人们——包括一般人群和知识精英——深信不疑。这里，我们集中检讨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对“近代文学”集体性的知识建构，梳理出一条精神线索，以期发现其间的意识形态面影，进而勾勒出另一幅权力/知识体制下的历史文化图景。

五四运动之后，刚刚取得胜利的新文学家们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新文学战胜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这场战役进行总结，以便确证自己的身份特征，更好地积累自己的文化资本。1922年，胡适应《申报》馆之约，为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年特设的纪念专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了著名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一个新文学家的身份，梳理了1872年至1922年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这篇文章应该还是比较早的对“近代文学”（尽管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予以理论观照和文学史叙述的重要文本，历来为文学史家和学者所关注和征引，影响深远，奠定了研究界对五四之前中国文学的评价基础。

胡适首先肯定了以曾国藩为首的“中兴派”对振兴桐城古文的贡献，但他紧接着说，伴随着曾国藩在1872年的死去，桐城派便成了强弩之末，古文运动也就到了它的死期。胡适对接下来二十多年兴起的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谭嗣同、梁启超的议论文章，章太炎的述学文章和章士钊的政论文章——一点评，虽有所肯定，但大都归结为失败的案例，归结为新旧文学过渡时代的一个勉强支撑的阶段，算不得什么光荣。紧接着，胡适用了大量篇幅介绍这个时期的白话小说，并不吝惜夸赞之辞，大加褒扬。他说：“在这五十

^① 牛仰山：《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前言》，牛仰山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概论·诗文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这些南北的白话小说，乃是这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这段小说发达史，乃是中国‘活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他的重要远在前面两段古文史之上。”^①

胡适肯定白话小说创作、贬抑古文创作的态度背后实际有一个文学进化的逻辑线索：文学愈晚近，价值愈高，发展愈好；背后还有一个白话语言优越论的评价体系：文学语言愈浅白，价值愈高，发展愈好。然而，即便是这样好的白话小说，在胡适看来，也不过同一千年来的白话文学一样有缺点：白话的采用都是无意的、随便的，而不是有意的，不是有主体主导的革新。他认为，这样的变化与演进是很慢的、不经济的。于是，胡适就引出了他撰写此文的旨归，那就是赞颂民国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他总结道：“近五年的文学革命，便不同了。他们老老实实的宣告古文学是已死的文学，他们老老实实的宣言‘死文学’不能产生‘活文学’，他们老老实实的主张现在和将来的文学都非白话不可。这个有意的主张，便是文学革命的特点，便是五年来这个运动所以能成功的最大原因。”^②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叙述方式其实是一种文学史的撰述方式。成功者在总结历史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加以放大，有意无意地抹杀或消解对手的历史功绩。胡适贬低近代文学四十五年成绩，有意夸大、放大文学革命五年间的成功经验，还用新和旧、活与死、先进与落后的对比，划一条时代的鸿沟，轻而易举地将五四前的文学归入失败的文学，彰显新文学运动的光明与发达，这种叙述策略不能不算成功。正如陈平原所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② 同上，第202—203页。

言：“比起此前中国历史上众多诗文革新运动，‘五四’一代更喜欢在‘文学史’框架中讨论问题。不管是‘破旧’还是‘立新’，讲‘进化’还是主‘演变’，其工作动力及理论预设，均来自‘文学史’的想象。建构一种文学发展模式，在重写文学史的同时，树立自家旗帜；而革命一旦成功，又迅速将自家旗帜写进新的文学史。”^①在胡适的叙述中，近代文学中有价值的只剩下白话小说，其他都只能归于“衰亡”或者“末路”的命运。即便是近代白话小说也因为缺乏组织和结构，而难于代表一代之文学。因此，在胡适那里，近代文学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文学。

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发表十年后的1932年，同样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家的周作人，在几次声称“文学小店关门”的情况下，却欣然应沈兼士之邀，前往北京辅仁大学大讲文学，先后共讲八次。很快，讲稿印行，定名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中国几千年来文学解释为两种文学潮流的交替循环演变：一种是注重抒发个人情怀的“言志派”，另一种是代圣贤立言的“载道派”，并认为，“五四”时期发生的新文学恰恰是独抒性灵的“言志派”占了上风，中国新文学的根源在晚明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他说：“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并不读竟陵派的书籍，他们的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从此，也更可见出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是相同的了。”^②

①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

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但并不简单。他为新文学寻找源头,并力争为之接上独抒性灵的“言志派”传统,这是针对三十年代日渐占据文坛势力的“左翼文学”。他看不惯“左翼文学”浓重的党派色彩,斥之为“新载道文学”,而他重提五四新文学的“言志”传统,是想告诉那些转向“左翼”的五四作家,别忘了你的根本。^①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周作人同胡适如出一辙地对五四前的近代文学毫不掩饰地轻视。周作人认为,清末虽然也提倡白话文,但是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不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而之前则是由古文翻译成白话;五四之后人们对待白话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即无论写什么都用白话,而之前的人用白话只是为了改造政治,启发民智,而在其他场合还是用古文,即所谓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周作人认为清末是“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②。

在周作人那里,言志派文学自然比载道派文学的价值要高。言志派文学是个性解放的文学,是前途光明的文学,故而进步;而载道派文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是没落腐朽的文学,故而落后。在他设计的文学循环体系中,清代文学是载道派的文学,而五四新文学是言志派的文学,因此,在他眼中,作为清代文学的一部分的近代文学整体上都是价值不大的,虽然他为梁启超说了不少好话。《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影响很大,它是新文学家自我建构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文本,影响了几代人关于文学史的总体想象。

论及“近代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不能不提及鲁迅及其《中国小说史略》。依鲁迅的目光如炬和持重审慎,想必对清末小说的评价不似上述胡、

① 参阅郝庆军:《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观上的思想分野和话语冲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②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周二人的刻意回护，自树旗帜。被视为“中国小说完整史书”^①的《中国小说史略》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专门讲了“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为近代小说的三种小说类型命名。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如何看取他前辈的小说创作，如何评价晚清小说家的艺术成就，非常值得探讨。

一般情况下，五四作家是瞧不起他们的前辈的，尤其瞧不起没有多少吸收西洋文学营养的本土作家。但鲁迅毕竟不同凡响。他耐心地细读了自己费时费力搜罗来的大量清代小说，细心地为之分类、摘录、钩玄提要、梳理脉络，然后整理、命名、分析研究、慎下断语。比如鲁迅关于清末的谴责小说与清中叶的讽刺小说的区别，观点就非常独到。虽然两类小说表面上比较相像，可《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在地貌和精神上都不相同，一个致力于倾尽全力地骂世，一个则是含蓄委婉地讽世，其细微处的区别，只有懂得创作的人方能体会。鲁迅的命名是出于他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对小说文体的独特感悟，他才不会轻易人云亦云，倒卖名词。再如，关于描写妓女与嫖客之间是非恩怨的小说，鲁迅给予“狭邪小说”的命名，独到而又准确，因为那些专门记录冶游和嫖妓的小说，充满了一种与正统世界相背离的价值追求，“狭邪”二字，特别贴切。

不过，遗憾的是，即便伟大如鲁迅也逃脱不了戴着“五四”的有色眼镜看取清末小说的命运，因为鲁迅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作家，他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浸润了新文化的液体，他的历史标准和美学标准不会脱离他的时代，正如他所说的，他不会“拔起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比如大家颇为熟知的关于他对谴责小说的评价：“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

① 阿英说：“中国的小说是因他才有完整的史书，中国小说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产生才有所依据的减少许多困难，得着长足的发展。”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小说闲谈四种·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